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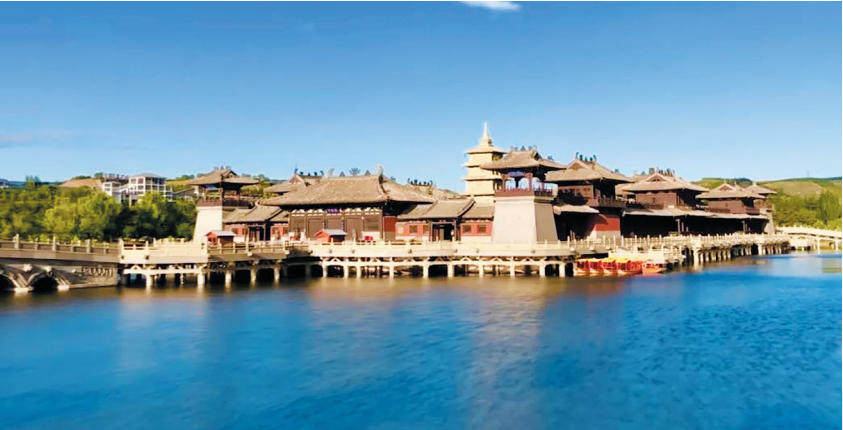
# 云冈研究院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上)



向晋卫(山西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五德终始是我们传统社会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政治历史观,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对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有非常大的标志性作用。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还是比较重视五德终始的,但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大学教科书里,这块内容是很缺乏的。我一直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社会重视的东西,今天也要重视。

历史观可以包括国家观、民族观、天下观、世界观、人生观,司马迁讲过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一直给学生强调这十个字,这是历史观最核心的内容。传统王朝要在历史上立足,或者是从历史观里寻找合法性,五德终始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五德终始大概形成于战国,这一理论和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成果到这个时候汇聚成了一套理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按照五行的排列方法得出两种说法,一种是五行相胜说,一种是五行相生说。再到后来,秦汉的理论家、政治家,把这套学说一直贯穿在社会发展



## 一片丹心系云冈

——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四十二年回顾(六)

解廷藩

### 三、云冈石窟科学保护技术的推广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石窟寺保护的“试验田”,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成就是显著的,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古代建筑修整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们把它推广到全国石窟寺文物的科学保护之中。

1965年,古代建筑修整所派我和李哲元赴四川绵阳,对其汉阙应用丙稀酸酯类材料进行封护加固;同年,龙门石窟派刘景龙同志前来云冈石窟专程学习。1981年,我应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毕宝启先生之邀,赴山东省益都县驼山石窟现场考察并为其制定驼山石窟修缮方案。1983年,我派化学组刘志刚、王迎春、员小云、傅琪四人赴山东省益都县驼山石窟进行两个月的裂隙灌浆粘接加固工程。1982年,古代建筑修整所调遣云冈石窟支援四川大足石刻,我派化学组陈桂林、唐贵赴四川大足石刻,参与其文物保护加固工程6个月。

1983年,我接受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张畅耕站长和浑源县文化局冯淑丽局长的邀请,对浑源县悬空寺进行化学灌浆加固工程(见本人论文,《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总第四期)。我担任浑源悬空寺维修加固工程技术领导,率队到悬空寺进行抢险加固工程。悬空寺建在岩壁上,参观路线十分狭窄,原来的参

的历史脉络中,历代王朝更替也按照这个顺序来比附。

王朝更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这两套王朝更替的理论正好和五行相似,秦汉帝国成立以后,就把五德终始作为立国的基本理论来运用。秦始皇首先把秦朝定为水德,根据阴阳五行相配合,秦朝崇尚的颜色就是黑色,对应的方位是北方。因为秦朝立国的时间很短,所以这种理论最终稳定下来应该是在汉朝。秦汉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伏羲、炎帝、神农,从考古的角度讲,好像都是传说,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存在或者王朝存在,但是对国来讲,重点是要从混乱无章的历史演变中理出头绪,司马迁认为我们都是黄帝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叫炎黄子孙。在对汉朝之前的历史整理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今天看来有很多漏洞啊,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历史观就是历史观,是汉朝确立的东西。从此以后,汉朝前面的历史争议也不是太大。

到了南朝,南朝人一般认为他们是中原文化的迁移到了南方,所以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按照五德终始理论排下来了。北魏也认为他们是黄帝的后裔,也是讲究五德循环、五德终始,彼此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延续。这是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凝结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历史理论。这种历史观其实浓缩了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价值关怀,我们的政治理想、伦理价值、人文关怀,都与这种历史观有关。



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孝文帝改革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也不纯粹是个人的政治文化取向,它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总的来说,这场改革是在一个非常浓厚的汉化基础之上进行的。孝文帝的祖先是拓跋鲜卑,来自于塞外,从北魏创立以后,在他之前的北魏统治者都是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北魏政权有非常好的汉化基础。

北魏建国以后实行的是“子贵母死”制,一位皇子如果被选定为太子的话,他的母亲就被赐死,目的是为了防止外戚擅权。孝文帝年龄非常幼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是由他的祖母冯太后抚育长大的。冯太后本身非常崇拜汉文化,在她的教导下,孝文帝也非常崇尚汉文化,自己在这方面也有非常深的汉文化修养,这是他推行汉化改革的一个基础。

在改革前后,北魏政权内部和外部都有改革的客观需要。从外部讲,北魏和南朝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古代的统治者有大一统的思想,无论是南方和北方,都有非常强烈的统一愿望,需要发展自身,壮大自身。要完成这样的政策取向,需要用改革来推动政权的发展。

从内部来讲呢,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已经定都平城近百年了,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贵族为主体的利益集团,承平日久,他们处于不思进取的状态,阻碍北魏政权的发展壮大。而孝文帝有非常强烈的改革的愿望。这个主观动机来自于哪里呢?其实跟儒学的“圣王盛世”政治理想有密切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以尧舜为榜样,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明

君圣王,希望开创一个像夏商周那样的太平盛世。

孝文帝改革是对胡汉文化的交流和整合,确切地说,是一个文化整合的政策。首先是关于迁都洛阳,实际上涉及到一种观念,洛阳是从东周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它都代表着一种正统地位,这是迁都洛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直接的原因。他是希望迁都洛阳推动整个鲜卑政权的汉化,涉及到服装、语言、习俗等多个方面。孝文帝对于服装非常重视,在他看来穿汉服跟国家形象密切相关,他有一次外出的时候,在洛阳城里看到有人不遵守国家的规定仍穿胡服以后,就非常地生气。他把服装问题提到了治国兴邦的高度。

关于孝文帝改革的特点,过去认为是雷厉风行的,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个改革不仅仅有雷厉风行的一面,还有温和的一面。首先是门阀政策,他保证鲜卑贵族的特殊地位,这就是对传统基业的一种巩固。第二是移风易俗中采取了很多措施,旧的习俗并不是一刀切地废除,保留了拓跋鲜卑人的早期基础制度,只是改变了技术方式,比如原来是由皇帝亲自祭祀,改革以后就由官员代替。再比如,迁都以后,一些拓跋鲜卑贵族不愿意到洛阳,他也做了一些退让,允许这些贵族冬天的时候在洛阳,夏天的时候回到平城,这种现象被称为“雁臣”,就是像大雁一样冬天在温暖的地方,夏天在北方。这实际上也是对保守势力的一种妥协和退让,或者说是包容和折中。另外,在语言改革上禁止说这个北语,但同时又做出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可以例外。这是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这些包容温和的折中措施减少了改革的阻力,有利于改革的推行。跟历史上其他的改革进行比较,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

孝文帝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民族文化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改革缩小了南北文化的差异,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梁有福 赵小霞 整理



### 作者简介

解廷藩,男,1940年8月出生,1958年参加工作,199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至2001年,在云冈石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42年。期间1960年至1962年在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工作学习三年。1981年,应邀参加中国科协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成立大会,成为第一批“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1984年,担任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副所长。1986年,应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邀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委主办的“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讨论会”(中国

承办),并提交“云冈石窟加固工程中呋喃改性环氧树脂的应用”论文。1987年,被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聘任为石窟保护技术委员会委员。1988年底,被聘任为高级工程师。2001年,正式退休。

主要荣誉及论文: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嘉奖(团体),是云冈石窟唯一参与者。1980年,被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授予先进文物工作者。2005年,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30年荣誉证书”。本人发表论文10余篇。

### (三)C型楼阁式佛塔的特点

Cb不仅继承了Ca中无正壁与侧壁之分等因素,并且开创了多层多龕等样。

在Ca型晚期楼阁式佛塔中以第5-28窟较为典型,是第5窟的附属洞窟之一,位于石窟区中部第5窟以东的“龙王庙”的西崖壁,坐西朝东。塔基四角以狮子承托的厚重方形塔基,塔身分上下两层,塔身下层,四面均为圆拱尖楣龕,龕内雕刻一坐佛,龕外各一胁侍菩萨。龕楣两端龙首反顾,龕楣上列供养天人。塔柱的上下层之间为仿木构出檐,檐下雕刻出阑额,上置一斗三升拱,屋檐雕刻出瓦垄。塔身上层四面均为盂形龕,内为一交脚菩萨和二尊胁侍菩萨。塔柱顶为华盖,依稀可见三角垂饰带。可见较晚的5-28窟无论从塔基、塔身、塔顶来看都是云冈第1窟中心塔柱模式的继承。

在Cb型楼阁式佛塔中,第39窟,塔身五层,各层面阔五间,也是以中间龕为中心,左右对称设置。上下层之间的雕刻有檐柱、枋斗、阑额、一斗三升人字拱、檐椽、瓦垄等建筑样式。第3窟外前室顶部平台上东西两端方形楼阁式佛塔,共三层,每层以中间龕为中心,左右对称,上下层之间的屋檐和斗拱的结构尚清晰可见。可见第39窟中心塔柱中龕的设置及上下层之间屋檐的设置是对第3窟外前室顶部平台上的东西两端方形三层楼阁式佛塔样式的继承。经过这几年的清理发掘,在第3窟外前室顶部平台上的东西两端方形三层楼阁式佛塔的底部可见屋顶的雕刻,可见当初可能要建前为殿堂后面为双塔的模式结构。

云冈石窟第4、3等窟,都是未完工的塔庙窟。云冈晚期洞窟第4窟中心方柱,塔柱的下层还没有雕刻,塔柱上层的四面为一佛二菩萨造像组合,从形制及雕刻内容来看,受到云冈第11窟的影响。该塔庙窟一门两窗的设置,拱门和明窗形成“品”字结构,这样的设置在39窟同样可以看到,这是晚期洞窟开创的洞窟结构模式。

由此可知,中期到晚期的中心塔柱的演变规律:中期的塔柱一般分上下两层(1、6、11窟),上下层塔柱中央开大龕,晚期的塔柱上一般设置多层,且每层要开多龕的样式,中期的中心塔柱龕内造像较大,晚期的龕内佛像缩小。从建筑特征来讲,晚期的中心塔柱更接近于当时的木构楼阁式佛塔。中期塔柱上方的华盖较大,如第1、2、6窟,基本可以覆盖中心塔柱,晚期中心塔柱的顶部明显缩小,如第39窟。中期中心塔柱的东、西、北的窟内壁面一般在中央大龕之间设置佛塔,与中心塔柱相互辉映,晚期的塔柱的壁面设置千佛。

### 三、云冈楼阁式佛塔的起源

云冈楼阁式佛塔的起源与犍陀罗佛塔与汉代木构建筑及北魏云冈流行的屋形龕等有关。

现知中国最早佛塔的实物形象,是四川省博物馆在什邡县皂角乡白果子村马堆子发现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三层木构佛塔图案。该实物形象发现于中国的东汉时期(25-220年),此时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在贵霜王朝的统治下进入佛像制作的高峰时期,犍陀罗最盛行的就是高层的佛塔,周围地区几乎不曾发现。中印通过当时中国西南部的滇缅道进行了佛教造像方面的交流,因此犍陀罗特征的一些高塔建筑最早进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如四川。四川省博物馆陈列的在什邡县皂角乡白果子村马堆子发现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三层木构佛塔图案应该就是当时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产物。之后又从西南地区传到中国中原地区。

在犍陀罗的佛塔中有佛龕的造像,佛坐于龕中,龕外有礼拜或供养者的形象,这些人物的形象远远小于佛像。有的佛龕中有比主尊更小的礼拜者或供奉者。龕中的佛像与佛陀浮雕中表现的主要形象有别,不表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是专门用来供奉的。龕像这时已经成为寺院主要的礼拜对象。这种龕像对中国的中心塔柱及楼阁塔中的佛像龕有深远的影响。

云冈楼阁式佛塔的起源与汉代一些建筑形式也是分不开的。这种佛塔印度不多见,应当是受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楼阁式高台建筑的影响。佛塔中逐层收进、逐层出檐的高层木构架、一斗三升拱及人字拱做为出檐的支撑结构,这些建筑元素都是汲取了汉代建筑元素中的一些特征。在湖北襄阳出土的东汉黄褐釉相轮陶楼中既有以覆钵形座承托相轮塔刹,也有中国传统出檐的结构,具备了佛塔的雏形。

在东汉墓葬陶楼建筑中斗拱、瓦垄等建筑结构较为常见,但瓦垄的垂脊上饰鸱尾的形象还比较少,云冈佛塔中饰鸱尾的形象较为普遍,这与在云冈早、中、晚期都比较盛行屋形龕并在其垂脊两端饰鸱尾的建筑模式有关,如第16窟内明窗与窟门之间的屋形龕的建筑上方就有鸱尾的雕刻,第9窟前室北壁窟门与明窗之间的屋形龕、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第3层佛传故事画面中的屋形龕、第13窟东壁第4层第2龕的屋形龕、第12窟前室西壁中层的屋形龕、第11窟西壁中层七佛的屋形龕、第6窟南壁明窗与拱门之间

## 云冈石窟楼阁式佛塔的特点与起源(下)

曹彦

“文殊问疾”等该窟中的诸多故事画面中都有的屋形龕,这种屋形龕,并在垂脊上饰鸱尾的形象正好被云冈的佛塔所吸收。屋形龕在第二期石窟中的出现是有时间顺序的,并且我认为这与云冈石窟中的汉式重层形楼阁式塔的出现有密切关系。

### 四、结论

云冈楼阁式佛塔的发展特点,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受印度式佛塔影响逐渐减弱,更多吸收中国传统的汉化建筑的发展过程,同时云冈晚期佛塔受云冈早期佛塔的影响也较为深刻,晚期佛塔与早期佛塔某些具体特征上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云冈楼阁式佛塔中的起源,佛塔中的造像组合是吸收犍陀罗佛塔中的一些造像元素,塔檐中的建筑元素则是吸收了汉代建筑中的一些元素,塔檐之上装饰鸱吻则可能来自云冈屋形龕之上的装饰。中原地区的浮雕图像最早见于云冈二期石窟。这里的浮雕图像指的就是云冈的楼阁式佛塔,可见探讨云冈楼阁式佛塔的类型与起源对于研究其他地区的楼阁式佛塔具有重要意义。



左图为第11窟东壁上层的佛塔

右图为第11窟明窗西壁的佛塔